

全球智库半月谈

新兴市场的高速增长可持续吗？

2014 年油价暴跌的七个关键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与人民币国际化

2014 年中国汇率与资本账户改革措施回顾

发展中国家借助贸易互惠协定突破改革瓶颈

中国 2015 年对外政策预测

本期编译

陈 博

高 歌

郭 楚

郭子睿

黄杨荔

李笑然

刘天培

刘兴坤

沈仲凯

唐靖茹

肖诗阳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强	国际金融
	茅锐	新兴市场	陈博	科研助理
	黄懿杰	科研助理	李想	科研助理
	孔莹晖	科研助理	黄杨荔	科研助理
	刘天培	科研助理	沈仲凯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沈仲凯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新兴市场的高速增长可持续吗？ 3

导读：本文发现，IMF 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速预测持续高于实际值，显示出过分乐观的倾向。这对政策制定者和国际投资者来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可能导致债务危机等后果。

2014 年油价暴跌的七个关键问题 6

导读：本文试图回答有关 2014 年油价暴跌的七个关键问题：1.供给和需求因素各自扮演什么角色？2.供给因素变化持久吗？3.油价暴跌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影响？4.对石油进口国产生什么影响？5.对石油出口国产生什么影响？6.对金融稳定的意义是什么？7.对石油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建议。

欧盟不应当对低油价寄予太多希望的六个理由 11

导读：即便油价持续徘徊在 50 美元/桶，欧盟经济也不太可能继续从中获得 1% 的增长；考虑到不断弱化的影响因素，油价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本文基于六个理由提出以上论断。

全球治理

全球金融危机与人民币国际化 16

导读：全球金融危机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越发重要。本文描述的是，相比于美元和欧元，人民币的地位如何发生改变及其未来发展前景。作者认为，未来十年之内，作为一种区域性贸易结算货币，人民币在东亚的地位将不亚于美元。同时，人民币也或将成为与欧元并肩的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

俄罗斯孤立的全球影响 19

导读：本文认为不论是西方主导的治理机制，还是尚未完善的金砖四国治理机构，都已经转向孤立俄罗斯。在全球治理机制中俄罗斯的孤立加速了其危机的爆发。

重返亚太 2.0 版 21

导读：意见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亚太地区是美国利益的重中之重，多数亚太问题专家支持奥巴马执政目标中“重返亚太”和“再造平衡”相关内容。然而面临 2014 中期选举失利，预算难以通过，以及乌克兰、伊拉克、伊朗问题围困等重重压力，关于奥巴马是否还能维持“重返亚太”计划的质疑陡升。在古巴移民政策等问题方面，奥巴马政府与新一届国会持对立态度，但亚太问题政策却是两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最大共识。因此白宫和共和党领导人是否能在今后两年就亚太问题上达成共识意义非凡。本文概括内容包括贸易、中国、防御、朝韩、印度和东南亚等相关问题。

经济政策

2014 年中国汇率与资本账户改革措施回顾 25

导读：本文从“沪港通”等新政策的实施、人民币国际化、储备资产管理等方面，对 2014 年中国汇率与资本账户改革措施进行了简要回顾，并提出了 2015 年改革展望。

发展中国家借助贸易互惠协定突破改革瓶颈 32

导读：从 1990 年到 2009 年，超过 500 个不同类型的贸易互惠协定（PTA）在各个国家之间签订。本文试图证明，要理解最近一轮贸易互惠协定浪潮的动机与结果，关键在于对这些贸易协定带来的“非贸易改革”效果的认识。本文认为，通过与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签署贸易协定，发展中国家可以促进国内争议性改革的通过与实施。

东亚地区 FTA 对贸易的影响 35

导读：虽然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起步较早，但直到 21 世纪之前，东亚一直被称为“FTA 真空”。进入 21 世纪之后，东亚自由贸易协定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其贸易效应的关注。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本文运用更详尽的数据，对东亚现存的 5 个 ASEAN+1 FTA 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实证分析，并得出了若干有意义的结论。

战略观察

打造亚太地区的核治理：下一个重大课题 38

导读：当前，关于亚太地区核治理问题存在多种不同层次的合作机制，对地区核治理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却由于机制的重叠和“碎片化”问题制约了核治理效果的进一步提升。作者认为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以提高核治理机制的统一化和一体化，最终切实根本加强地区核治理能力。

两个故事的故事：亚太地区的博弈 41

导读：通过举办 2014 年 APEC 峰会，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实力举世瞩目，而美国由于受到内政外交的各种现实情况的制约，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地位被认为有所下降。作者认为，美国固然正在经历内政外交上的困局，但不应过分解读这是美国的衰落。同时，美国必须调整和完善政策，继续将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纳入到国际体系中，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美国领导下的国际治理，并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

中国 2015 年对外政策预测 44

导读：新年伊始，学者 Tim Summers 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了题为 Chinese Foreign Policy: What to Expect in 2015 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归纳了过去一年中国外交的特点，对 2015 年中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预测，认为在新的一年里对外政策仍然是中国领导层的关注重点，强有力的外交和渐进地改革国际秩序的努力将是对外关系的重要特征。

本期智库介绍 46

新兴市场的高速增长可持续吗？

Giang Ho 和 Paolo Mauro /文 陈博/编译

导读：本文发现，IMF 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速预测持续高于实际值，显示出过分乐观的倾向。这对政策制定者和国际投资者来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可能导致债务危机等后果。编译如下：

随着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人们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寄予越来越多的厚望。在过去十年中，这些经济体的平均增速（以人均 GDP 增速来看）大概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但是，本文认为，对这些国家的大部分预测都过于乐观了，并且随着预测时间的拉长，乐观程度也在放大。错误的预测不但会损害跨国公司的利润、国际投资者的回报，还会扭曲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

例如，政策制定者一旦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过于乐观，就可能低估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这将导致难以预见的债务危机和突然性财政紧缩。和发达国家一样，债务危机在发展中国家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无预期的长期增速下滑，相应的例子包括上世纪 70 年代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积累、80 年代南美洲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债务危机、90 年代高负债低收入国家的危机，以及 2007-2008 年的全球危机。

错误预期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对产出缺口的错误估计，并进一步导致央行货币政策的错误。当人们没有意识到实际产出确实在下降时，可能实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少人认为，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通胀的原因，就是当局因错判产出缺口而推迟了加息时间。

越来越多学者发现，对五年及以上的长周期增长进行预测时，会出现系统性的乐观偏差。人们会认为，近期的增长可以延续下去。例如，萨默斯认为，对中国和印度的长期增长预测没有考虑均值回归效应。政策制定者们也对过度乐观越来越警醒。IMF 在 2014 年 10 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下调了对金砖国家和东欧国家的增长预期，并承认此前的预期存在高估。

1、过去的增长能够预测未来的增长吗？

历史经验表明，过去的增长并不是预测未来增长的上佳参考。188 个国家 1950-2010 年的数据显示，经济增速在加速扩张后存在均值回归的迹象（回复到平均值水平）。表 1 显示，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经济增速之间不存在显著区别；表 2 表明，过去的增速不能很好地预测未来，十年人均 GDP 增速和下一个十年增速之间的相关性很低。即使用每年增速之间的自回归系数来衡量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

表 1: 人均收入平均增长率 (每年百分比)

	1970s	1980s	1990s	2000s
Advanced economies	1.6	1.7	2.0	1.5
Emerging-market economies	2.7	1.0	1.9	3.0
Developing economies	2.0	0.7	1.2	3.1

表 2: 十年增长率间相关系数

	1970s with 1980s	1980s with 1990s	1990s with 2000s
All countries	0.34	0.37	0.24
All countries, excluding fuel exporters ¹	0.43	0.48	0.31
Advanced economies	0.33	0.02	0.24
Emerging-market economies	0.27	0.53	0.36
Developing economies	-0.07	0.13	0.20

2、长期预测和近期实际情况的比较

将长期增长预测（10-20 年周期）和实际增长率做比较，可以发现：过度乐观十分常见。我们使用均值回归技术，并采用 20 年的持续性系数，将结果和 IMF 与世界银行的债务可持续性预测结果做比较，发现预测结果明显长期高于均值回归技术预测的增长率。以增长率处于均值水平的国家为例（经济增速为 1.4%），预测结果比均值回归技术的结果高 1.7%，以 10 年为周期也可以产生类似的结果，尽管高估程度有所减小（1.1%）。

高估经济增速 1% 或者更多，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假设一国的债务/GDP 比重 10 年左右均保持在 50% 的水平，如果每年 GDP 实际增速比预期值低 1%，那么 10 年后债务/GDP 比重将升至超过 70%，并在 20 年后升至 120% 以上。

Consensus 和 OECD 的预测同样过于乐观。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等，这一现象十分明显；但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预测结果较为符合均值回归。这一差异并不奇怪：过去二十年内，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接近 50 年来的平均值，而发展中国家增长强劲，高于历史标准。

3、过分乐观的原因和对策

过分乐观的经济预测可能导致政策错误。过分乐观的起因之一是人类的天然性。此外，研究表明，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决定增长的制度性特征，如经济政策、教育水平等比增长本身更加稳定持久。因此，对于一个高速增长的国家来

说，很难在基本面没有重大改变的情况下下调他们的增长预期。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比较疲弱，通常被认为是政治危机、战争等原因所致，而这些因素在预测中都没有被考虑进去。本质上，这些负面冲击是难以预测的，尽管从概率来说，这些事情很可能会发生，尤其是那些经历过类似冲击的国家。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策制定者、国际投资者和跨国企业有着重大意义。首先，预测者需要更多地考虑悲观情形。在决定基准情形时，人们应该首先反省：为什么这些国家持续与均值回归情形相背离，而不是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会下降。悲观情形或许比乐观情形更加符合现实。所有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去推动发展中国家增长——对于它们来说，过分乐观带来的危害更大——比如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国际劳工政策和资本流动，这些政策最终会惠及所有国家。

本文原题为“Rapid Growth in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Now and Forever?”。本文作者 Giang Ho 和 Paolo Mauro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12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2014 年油价暴跌的七个关键问题

Rabah Arezki 和 Olivier Blanchard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本文试图回答有关 2014 年油价暴跌的七个关键问题：1.供给和需求因素各自扮演什么角色？2.供给因素变化持久吗？3.油价暴跌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影响？4.对石油进口国产生什么影响？5.对石油出口国产生什么影响？6.对金融稳定的意义是什么？7.对石油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建议。编译如下：

本文试图回答有关 2014 年油价暴跌的七个关键问题：1.供给和需求因素各自扮演什么角色？2.供给因素变化持久吗？3.油价暴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4.对石油进口国的影响。5.对石油出口国的影响。6.对金融稳定的意义是什么？7.对石油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建议。

结论如下：第一，这次的石油价格暴跌，是供给和需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石油价格会反弹，但 2015 年仍会保持低位；第二，石油进口国收入增加，产出的投入成本降低，国际收支改善；石油出口国利润降低，面临着国内财政赤字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的双重压力；第三，金融稳定的风险增加，但风险可控；第四，对于没有足够资金的石油出口国，财政预算约束和汇率压力会很大。如果货币政策不当，会导致高通胀和本币进一步的贬值；第五，油价降低为很多国家提供了降低能源补贴和能源税改革的机遇；第六，欧洲和日本需求疲软，传统货币政策效果有限。欧央行和日本央行需要使用前瞻性引导中期通胀预期

1、供给和需求因素各自的角色

石油价格自 2014 年 6 月以来已经下跌了近 50%，自 9 月以来下降了 40%。需求的降低大概只能解释油价下跌的 20%-35%，供给过剩是油价下跌的主要因素。

导致供给过剩的因素很多。但主要因素是 OPEC 最大石油生产国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供给持续增加的情形下依然公开宣称不会减产石油。到 11 月，OPEC 宣布仍保持每天生产 3000 万桶石油，尽管石油供给已经过剩。

多年来石油供给一直在增加，但石油价格一直在高位，这是由于 OPEC 的垄断定价。这次油价的下跌有助于人们改变对未来石油供给的预期，也让石油价格更接近均衡价格。

2、供给因素的变化有多持久？

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 OPEC 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是否愿意减产。这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改变战略背后的动机，以及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一个假设认为：面对非 OPEC 石油供给的稳步增加，沙特阿拉伯已经发现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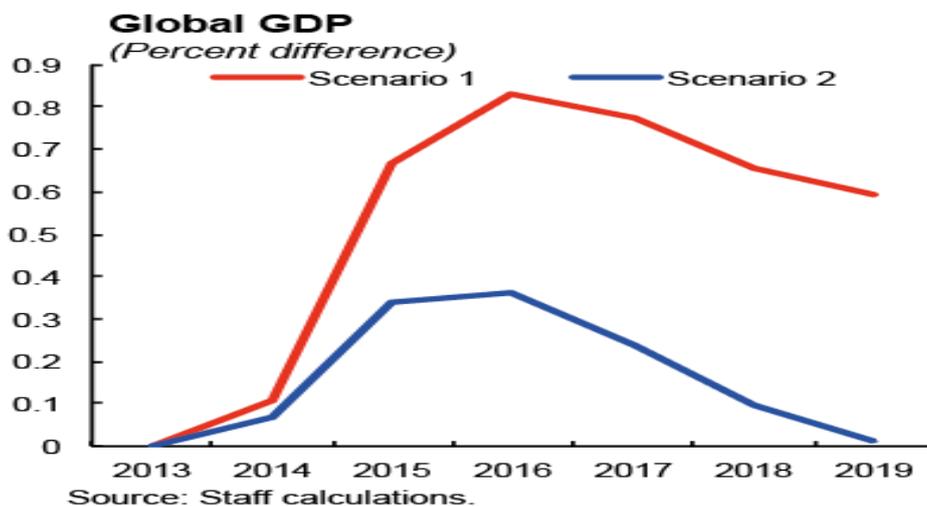
持石油供给调节者的地位和石油高价的成本越来越高。如果是这样，除非 OPEC 和俄罗斯达成协议在未来一起降低石油产出，否则这一战略很难转变。另一个假设认为，OPEC 国家通过降低利润和投资，最终导致非 OPEC 国家石油生产国利润降低，从而减产。因为他们的开采成本要远远高于 OPEC 国家。

第二个因素是石油产出对低油价的反应。证据显示，石油生产的资本支出已经开始下降。Rystad 能源公司认为大型石油公司的总体资本支出在 2014 年第三季度同比下降 7%。在目前每桶 55 美元的价格水平下，2015 年石油产出仅仅会下降 4%。但石油生产的回报率会大幅降低，没有对冲石油暴跌的公司会面临巨大的债务压力，而且正在大规模的降低石油生产的资本支出。

当然利比亚、伊拉克、乌克兰和俄罗斯地缘政治局势可能更加紧张的事实也不应该被低估。

3、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整体来看，由于供给因素导致的油价下跌有助于全球经济增长。但量化这一影响的关键取决于供给因素可以多大程度上解释油价下跌以及供给变化的持续性。考虑到未来不确定性，我们分两种情形来量化。第一种假设供给变化可以解释未来石油市场价格下降的 60%，第二种假设起初供给变化可以解释 60%，但这一解释程度逐渐降低，到 2019 年为零。模拟结果如下：



第一种情形意味着全球产出在 2015 年上升 0.7%，2016 年上升 0.8%。第二种情形的影响显然更小。2015 年上升 0.3%，2016 年上升 0.4%。

4、对石油进口国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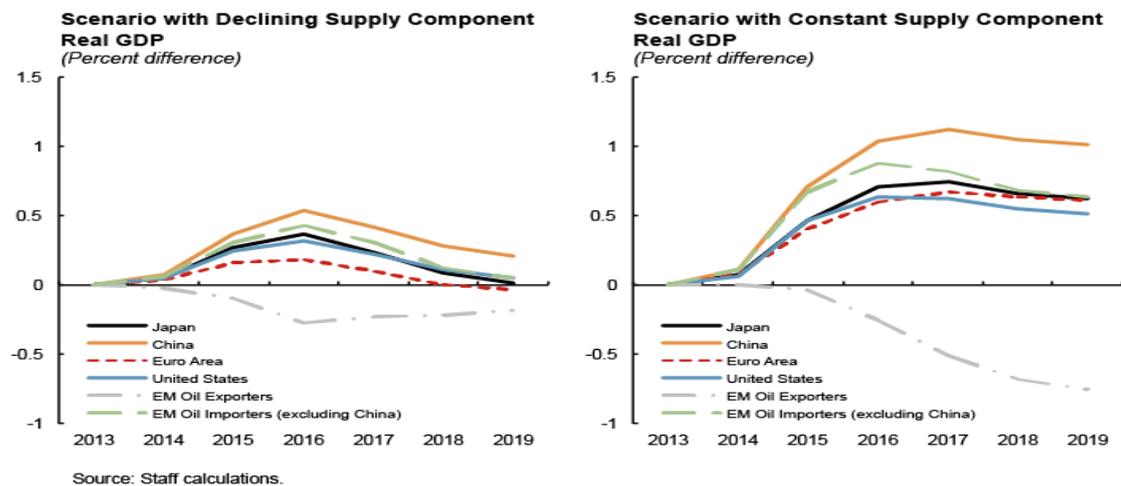
油价下跌通过三种渠道影响石油进口国。一是实际收入增加，消费增加；二是最终商品的成本下降，从而企业利润、投资增加；三是对整体通胀和核心通胀率的影响。不同的国家受到的影响程度不一样。

能源依赖型的国家，实际收入和利润的影响更大，比如中国和印度。美国消费的石油一半以上源于自己生产，因此它的实际收入影响要小于欧洲和日本。

对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依赖于低油价对整体通货膨胀的直接影响以及油价对工资或其他价格水平的传导。这种传导跟实际工资的粘性和通胀预期有关。

在正常时期，对于较低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央行会更大程度地降低名义利率，从而导致更低的实际利率。但目前的发达经济体都陷入流动性陷阱。

我们的模拟结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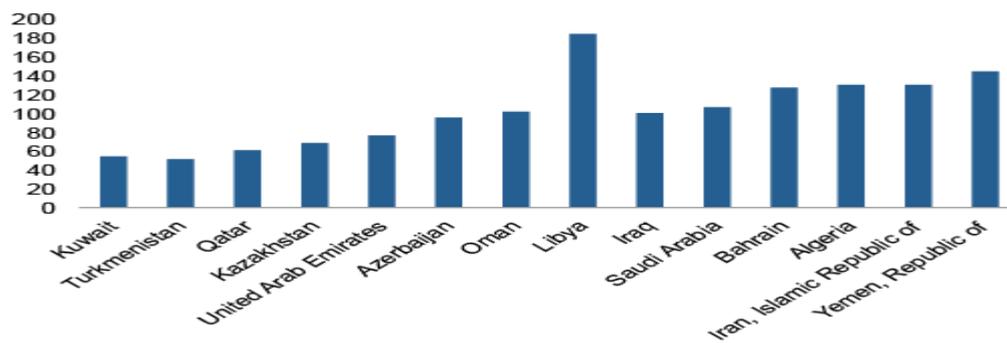


可见：两种情形下，油价下跌对中国的影响均超过了对日本、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影响。但我们的模拟没有考虑该国家针对油价下跌可能要采取的措施、币值和能源税等相关因素。

5、对石油出口国的影响

油价下跌对石油出口国整体不利，但每个国家受到的影响程度并不一。对石油出口越依赖的国家，受到的不利影响越大。在大多数国家，油价下跌可能造成财政赤字。我们通过计算使石油出口国达到财政平衡的石油保本价格，来说明石油出口国的脆弱性。结果表明：各国的石油保本价格都很高。中东和中亚国家石油保本价格范围是从每桶 54 美元到 184 美元，沙特阿拉伯为 106 美元每桶。具体结果如下：

2015 年财政平衡的石油保本价格（美元/桶）(USD per barrel)



面对持续的油价下跌，很多石油出口国可能面临着财政紧缩、产出下降以及货币贬值。

6、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油价下跌可以通过两种渠道影响金融稳定：一是油价本身，二是影响汇率。

油价的下跌会削减石油部门企业的资金头寸，尤其是那些持有美元负债的企业。从而银行以及相关金融机构的头寸也会降低。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现金流/利息在 2 以下的能源企业大概占 31%，这些公司都面临着高风险。对银行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油价下跌的持久性以及本国的经济活动。

油价的下跌还会导致石油出口国货币的贬值，尤其是对美元贬值。俄罗斯的卢布就是最好的例子。货币贬值会加重企业的外债，也有可能引致高通胀。

如果油价持续下跌，那些大量持有石油行业股票的银行的风险就会上升。当然，全球银行体系的风险会被一些石油进口国比较优良的信贷部分抵消，但一些石油进口国的金融部门和石油出口国有很紧密的联系，这必然又会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7、对石油进出口国的建议

显然，对石油进口国和出口国的政策建议是不同的。但有一点例外，低油价为石油进出口国都提供了能源补贴以及能源税改革的好时机。IMF 一直在倡导各国将能源补贴转移到基础设施建设上。低油价使各国政府以最小的政治成本来实现上述转移。

现在我们转向石油进口国。在没有产出缺口时，石油进口国应尽量保持通胀稳定和经常项目平衡。面对低通胀，货币政策应该尽量保持通胀预期稳定。经常账户的改善会导致本币升值，这种升值是自然的、可取的。但目前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存在巨大的产出缺口，且通胀过低。传统的货币政策因陷入流动性陷阱而失效。这意味着需求需要扩张，稳定中期通胀预期非常关键。

对于石油出口国，他们需要降低政府支出。对于那些前期积累了大量资金的政府，应该考虑更大的财政赤字，并逐渐使用这些资金，尤其是对于采取固定汇率制的出口国。对于那些没有太多财政空间的国家，这次调整会比较艰难。他们需要一次较大幅度的实际汇率贬值。

8、结论

第一，这次的石油价格暴跌，是供给和需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石油价格会反弹，但 2015 年仍会保持低位；第二，石油进口国收入增加，产出的投入成本降低，国际收支改善；石油出口国利润降低，面临着国内财政赤字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的双重压力；第三，金融稳定的风险增加，但风险可控；第四，对于没有足够资金的石油出口国，财政预算约束和汇率压力会很大。如果货币政策不当，会导致高通胀和本币进一步的贬值；第五，油价降低为很多国家提供了降低能源补贴和能源税改革的机遇；第六，欧洲和日本需求疲软，传统货币政策效果有限。欧央行和日本央行需要使用前瞻性引导中期通胀预期。

本文原题为“The 2014 oil price slump: Seven key questions”。本文作者 Rabah Arezki 为 IMF 高级经济学家，Olivier Blanchard 为 IMF 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5 年 1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欧盟不应当对低油价寄予太多希望的六个理由

Georg Zachmann /文 刘天培/编译

导读：即便油价持续徘徊在 50 美元/桶，欧盟经济也不太可能继续从中获得 1% 的增长；考虑到不断弱化的影响因素，油价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本文基于六个理由提出以上论断。编译如下：

在账面价值上，石油可能是对欧盟影响最大的原材料。2013 年，欧盟消耗了 40 亿桶石油。直接花费 4 千亿欧元，占当年 GDP 总额的 2.2%。油价减半让消费者少付了约占 GDP 1% 的价格。其他能源成本也受其影响而下降。

过去的 60 年里，当能源价格下降后，一国的经济很有可能在第二年有更好的表现。这个证据让欧洲经济获得一线希望。我们对一国油价（美元）的对数和一国真实 GDP 的对数做了线性回归，样本包括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见表 1）。石油出口国，如阿拉伯国家等 GDP 随着油价上升而增加。油价翻倍，石油需求大国（如经合组织国家）的 GDP 下降 2~3%。如果这个相关性成立，我们可以推测油价跌去一半，欧盟会经历 2% 左右的增长。然而即便是忽略了模型中存在的种种方法问题，这个相关关系也不构成普遍规律。表中显示置信度太低（低于 5% 可认为是不显著）说明油价并不适用于预测 GDP。

表 1 按置信度分类的不同国家油价与 GDP 相关关系（1962-2014）

Region	Coefficient (β)	confidence level (p-value)
United States	-0,03	0,00
Arab World*	0,05	0,01
High income: OECD	-0,02	0,02
OECD members	-0,02	0,03
World	-0,02	0,06
Countries of EU28	-0,02	0,07
Countries of the Euro Area	-0,02	0,15

注：绿色代表低油价促进 GDP 增长；红色代表低油价拖累 GDP；粗体表示置信度为 5%。

数据来源：WB 提供真实 GDP；BP 能源统计 2014 提供油价信息。

*阿拉伯国家数据只包括 1975 年之后。

回归方程为：

$$y_t = a + \beta x_{t-1} + e; \text{ with}$$

$$y_t : \ln(\text{real_GDP}_t) - \ln(\text{real_GDP}_{t-1});$$

$x_t : \ln(\text{realoilprice}_t) - \ln(\text{realoilprice}_{t-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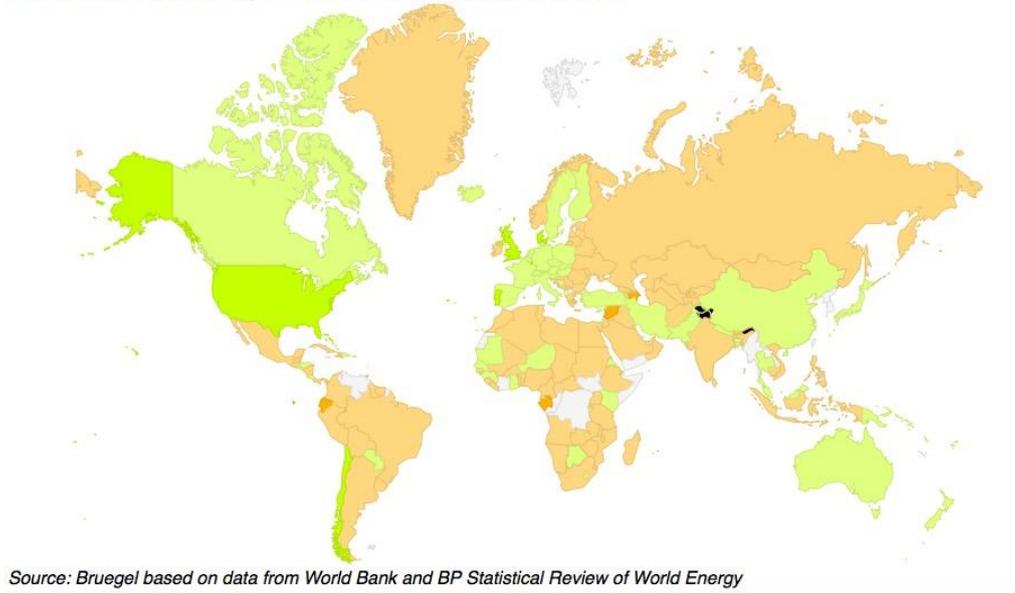
系数 β 是油价增倍后下一年 GDP 增量

有六个理由让我们认为低油价带来经济增速是有限的：

- 油价下跌产生的效果不如油价升高的效果明显
- 油价对于宏观经济的重要性下降。
- 当前经济环境降低价格负面冲击的效果
- 石油需求方的价格冲击对经济影响较弱
- 贸易条件指数恶化限制对生产、投资和就业的影响
- 石油出口国的政治影响导致某些经济风险

图 1 地图上不同国家油价与 GDP 相关关系（1962-2014）

Map: Coincidence of oil-price changes and real GDP changes 1962-2014



数据来源：WB 提供真实 GDP； BP 能源统计 2014 提供油价信息。

1、油价下跌产生的效果不如油价升高的效果明显

研究显示（Hamilton, 2009）2007-2008 年，18 个月内油价从 50 美元/桶上升至 150 美元/桶导致美国经济衰退。与之相反，我们如今面临的是油价下跌，这会让经济增速吗？Mork (1989) 的研究显示，油价上涨对经济的作用明显强于油价下跌的作用；随后其他研究（Lardic and Mignon, 2008）也证实了这个结论。

注：这个结论并非毫无争议。一些研究认为负面冲击的效果取决于冲击规模、其一，研究认为（Huang 等，2005）存在油价冲击的临界点，一旦超过临界点，

影响较大。Kilian (2012)认为正是由于临界点的存在才导致之前的研究的结论。也就是说，此次油价冲击若超过临界点，其影响也会非常显著。

2、油价对于宏观经济的重要性下降。

Gregorio 等(2007)发现，从历史来看，油价对于产出和通胀的影响在不断减弱。他们认为重要的因素其实是极度依赖石油的国家数量不断减少、汇率传递效应减弱和更加良性的通胀环境。此外，工资灵活性升高、汇率自由浮动、全球贸易开放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不断增加等因素也有贡献（Chen, 2009）。

当然，把我们的样本从时间上分开，将分界点设为 1992/93 年。我们发现 92 年之后油价冲击效果大幅减弱。平均 β 值（正值）从 0.038 下降至 0.026。平均 β 值（负值）从 -0.033 上升到 -0.020。对于欧盟来说，油价下降一半意味着 GDP 预计增加 1.1%，但是并不显著（p 值为 0.57）。

图 2 1992 年之前不同国家油价与 GDP 相关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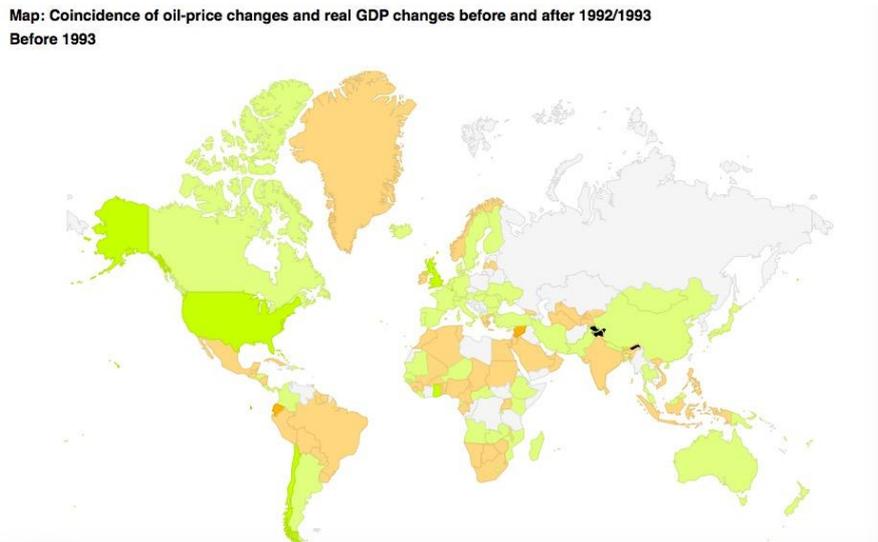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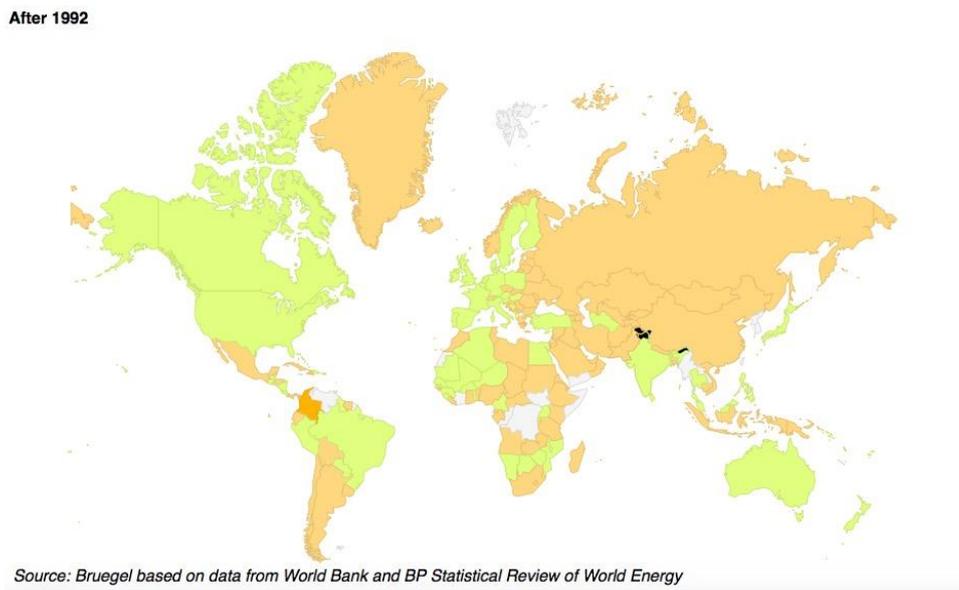


图 3 1992 年之后不同国家油价与 GDP 相关关系



数据来源：WB 提供真实 GDP； BP 能源统计 2014 提供油价信息。

3、当前经济环境降低价格负面冲击的效果

随着欧盟采用了许多降低油价冲击效果的经济政策，包括确定通胀目标、让工资体系变得更灵活和贸易开放，预计当前的油价冲击效果会大幅降低。另外 Lee 等(1995)认为一个稳定经济体所受冲击幅度大于一个不稳定经济体。既然价格波动幅度已经巨大，那么油价变动能够产生的效果就不是那么明显了。当前欧盟经济形势不稳定，所以下跌的油价所造成的效果可能并不明显。

4、石油需求方的价格冲击对经济影响较弱

Kilian (2008)认为需要了解油价冲击的本质。油价上升有不同来源。某些经济体经历繁荣，对石油需求上升（需求冲击），上升的油价其实是结果而非原因。然而意外的石油减产带来石油供给下降（供给冲击），减产其实是经济衰退的表征。所以将因果倒置，预期石油生产规模扩大带来较低的油价使得欧洲经济回暖。

然而当前的油价冲击是预期石油生产规模扩大（美国）和预期石油生产规模减小（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混合体。所以相反的预期使得油价冲击削弱了油价冲击的影响。

5、贸易条件指数恶化限制对生产、投资和就业的影响

投资方面，目前的研究尚未指出低油价和商业投资有正相关关系。只有相关产业才会有影响。

就业方面，不同部门受到不同影响。对于进口国家，石油替代产品的相关产业随着油价降低而萎靡。而低油价能给互补产业带来繁荣。两者抵消，总就业影响较小。

Bodenstein 和 Guerrieri (2007)发现当金融市场存在缺陷，石油进口国将不得不贬值本国货币来出口本国商品，以得到购买外国石油的货币。那么油价下跌时，石油进口国的非石油出口会减少，然而财富会增加。

6、石油出口国的政治影响导致某些经济风险

石油出口国由于油价下跌，公共预算会受到负面影响。这些国家要么节俭一些，要么就经历赤字。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大量的主权财富基金，那么赤字的规模就收到限制。但是过度减少财政支出会使得社会不稳定，甚至引发宗教冲突，这又会打击经济形势。

另外，大量石油出口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在了石油进口国（例如欧盟）的金融市场上。一旦石油出口国调回这些基金用于补充国家财政预算将会影响石油进口国的金融稳定性。

7、结论

下跌的油价使得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重新分配。同样，财富会从石油出口国转移到进口国。但是总体影响小于各部门的影响。即使油价持续在 50 美元/桶左右，它不能很好地刺激欧盟经济。

本文原题为“Six reasons why we should not invest too much hope in lower oil prices”。本文作者 Georg Zachmann 为 Bruegel 研究员。本文于 2015 年 1 月 13 日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全球金融危机与人民币国际化

Alex Cukierman/文 沈仲凯/编译

导读：全球金融危机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越发重要。本文描述的是，相比于美元和欧元，人民币的地位如何发生改变及其未来发展前景。作者认为，未来十年之内，作为一种区域性贸易结算货币，人民币在东亚的地位将不亚于美元。同时，人民币也或将成为与欧元并肩的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编译如下：

1、人民币越发重要的地位

根据 2007 的三年期央行调查（Triennial Central Bank Survey），在美国次贷危机前，同时也是希腊发生债务危机的两年前，外汇市场上的日均总成交量中美元的单边交易占到了 85.6%，是运用最广泛的贸易通货。相比之下，欧元占到了 37%，作为第二贸易通货，却被美元远远甩开。同样的标准下，人民币仅仅占到 0.5%，位列第 20。到 2013 年 4 月，美元的占比上升至 87%，欧元下降至 33.4%，而人民币则迅速攀升至 2.2%。

尽管欧元和美元在这六年间（2007—2013）分别有所下降和上升，但二者都维持着他们第一和第二的位置。而人民币则是从第 20 位攀升至第 9 位，虽然它的占比依然很少，但是其增长速度却是不容小视。如一些人所认为的，如果人民币单边交易的占比持续增长，那么在未来十年，人民币或将达到与日元、英镑相当的地位，成为全世界最核心的货币之一。

认为人民币能够在十年间达到世界核心货币的观点由来已久，早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就有这样的观点（Carbaugh 和 Hedrick 2009, Salvatore 2011）。这主要是基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近 30 年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占比的增长率，以及与人民币相似的历史先例，即一百年前包括美元在内的货币与现在的人民币面临相似环境（Eichengreen 2011）。尽管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中国在经常账户中无疑是“巨头”，但在资本账户中依然是落后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币显然距离美元和欧元这样的核心货币还颇有差距。而就外汇市场的交易额和作为储备资金的货币而言，依然还是以日元、英镑、瑞士法郎，乃至澳元和新西兰币为主。

2、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元和欧元相对于人民币的地位

尽管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并没有显著改变人民币对于美元及欧元的相对地位，但是却显示了在未来五至十年，将人民币作为区域性核心货币的可能。自从次贷危机爆发，以及美国与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之后，美国与欧元区的真实 GDP 和国际贸易活动都有所减缓。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同样波及到了中国，使其实际增长放缓。而对于欧元区，其真实 GDP 增长持续放缓。从 GDP 和国际贸易角度来看，中国的相对（欧元区的）地位都得到了提升。

大约是在 2008 年 11 月的 G20 峰会后的一年，作为成员国之一的中国宣布这一组织将取代 G8 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由于中国并非 G8 成员国，这一官方变动使得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更有话语权。中国在国际金融影响力的承认，似乎促使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一项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将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要的储备通货（周小川，2009）。尽管这一提案没有通过，但这标志着中国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开始。

成为核心货币的条件之一是这一货币要拥有流动性的债券市场。这一点上，以人民币结算的资本市场显然比不上美国和欧元区。但是，由于美国和欧元区减少新债券的发放，金融危机使得中国与二者的差距得以缩小。尤其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大幅度缩小了其新债券的发放，从 2004-2007 的年均三万亿美元，缩减至 2008-2013 的年均两千亿美元。对于欧元区，其债务危机带来了更严重的影响，从 2007-2009 的年均近两万亿欧元降至 2010-2013 的零点。

与之相对，人民币结算的离岸债券发行量在近几年有了较大的增加。由 ASIFMA 出版的人民币路线图（RMB Road Map）报告称，离岸人民币债务在经过此前三年超过 200% 的增长后，于 2014 年第一季度达到顶点，卖出了 310 亿美元。如果这一相对的趋势持续更长时间，由人民币结算的债券市场将迅速提高其地位。在 2011 年的前三季度中，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包括商品和服务）占到了中国总贸易量的 8%。中国政府同样在推动这一发展趋势，尤其是与东盟成员国的贸易合作关系上。

3、核心货币：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的未来发展

目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中国超越美国的时间进一步提前。根据 Jorgenson 和 Vu（2011）的估计，这一超越会在 2018-2020 年之间发生。显然，这也会使得人民币的地位随之上升，至少达到主要区域性货币的程度。而这也给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带来焦虑，加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差距扩大，金融危机也将推动人民币的可兑换性。但问题在于何时开放？中国政府非常关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由于对国内金融体系和汇率的管制，中国官方正致力于提升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上的地位并创建一个以离岸人民币结算的资本市场。目前由于存在在岸与离岸的区别，中国政府可以培养在国际上以人民币结算的债券市场，同时依然保有对在岸金融体系的控制。

自 2006 年起，中国政府允许人民币显著而缓慢的、有控制的升值——即从 2005 年 8 元兑 1 美元到 2014 年 11 月的 6.13 人民币兑 1 美元。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以及对汇率自由化的预期，似乎预示着人民币会进一步升值。这又进而使得在离岸市场上对人民币结算的债券的需求及其本身规模的扩大。

Eichengreen 和 Flandreau (2009, 2010) 证实了一个有趣的相似性：20 世纪初期的美元和现在的人民币。不过在 1914 年，虽然美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过英国，但当时的核心货币依然是英镑。Eichengreen 和 Flandreau 证明了，在当时的背景下，加之美国政府对美元国际化的积极政策，美元取代英镑仅仅用了 10 年时间。这一历史插曲暗示着，如果中国政府采取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人民币很可能将不久成为世界核心货币。

这里的焦点就在于，采取何种策略取决于中国政府如何权衡：一方面，促进人民币成为核心货币能带来收益；另一方面，由于放弃对在岸金融市场的管制，可能随之带来政治和经济上的风险。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决不能忽视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基本差异：美国更多的是主张小政府、自由市场以及个人主义；而在中国，个人行为应服从于整个国家的需求 (Craig, 2009)。这种意识形态意味着，由于已有的高增长，政府应当保持足够的管制以达到国家的整体目标。

4、总结性评论

总之，根据美元及英镑的先例，中国政府有能力迅速提升人民币的地位，但他们或许会延迟具体的实施，因为放弃对金融体系和汇率的管制将带来很大的成本。另一方面，最近的经验告诉我们，金融危机（例如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会鼓励中国政府加速自由化进程从而更快获得核心货币地位。

在十年内，人民币会超过欧元，并至少与美元旗鼓相当，成为在东亚地区的主要贸易结算货币。同时，人民币也或将成为与欧元相当的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假使美国不再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元将维持它在全球（除却东亚）贸易结算及资本项目交易中第一货币的地位。对于欧元，它将依然是欧洲的主要货币，但它的日均外汇交易额占比会继续下降，甚至将为人民币所超越。

遥想十年后，最有可能的便是“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元维持其最核心的地位，欧元在欧洲地区扮演主要货币的角色，而人民币则在东亚地区至少成为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实现与欧元类似的职能。

本文原题为“The Crisis and the renminbi’s international role”。本文作者 Alex Cukierman 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巴格拉斯经济学院教授，同时也是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于 2015 年 1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俄罗斯孤立的全球影响

Domenico Lombardi 和 Harold James /文 李笑然/编译

导读：本文认为不论是西方主导的治理机制，还是尚未完善的金砖四国治理机构，都已经转向孤立俄罗斯。在全球治理机制中俄罗斯的孤立加速了其危机的爆发。编译如下：

当前的俄罗斯危机，尤其是卢布的暴跌，不仅暴露出俄罗斯经济的脆弱性，而且也显现出了当前的国际秩序以及评价经济和政治可持续性的标准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事实上，这场危机本可以避免——俄罗斯在全球治理机制中日益孤立的状况加速了危机的爆发。

1、新兴经济体如何防范危机？

自从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 1997-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同样影响了俄罗斯)之后，新兴经济体就下定决心不再重蹈覆辙。他们确定了三种方案来控制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为抵御投机性攻击而储备大量资金，避免出现较大的经常项目赤字(盈余用来积累储备)以及将公共和私营部门外债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同时，新兴经济体还吸取教训，认识到提高透明度、减少腐败的重要性。此外，政策制定者和金融机构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构建预警指标来防范危机的出现。

2014 年以前，俄罗斯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表现良好，没有任何预警的迹象。2013 年，公共部门外债仅占 GDP 的 3.8%，而私营部门外债 30.2% 的 GDP 占比也在合理范围内。去年春天，得益于经常账户的大量盈余，俄罗斯的外汇储备高达 4720 亿美元，而且据俄罗斯央行报道，其国外总资产高达 1.4 万亿美元，高于 1.2 万亿美元的负债。

2、问题出在哪儿？

一个问题可能是，在危机中资产的调动比较困难。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克劳迪奥(Claudio)和申铉松(Hyun Song Shin)指出，海外市场越来越多的金融中介机构导致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换句话说，俄罗斯公司在海外筹集的资金不必调回本国，那么一旦公司需要付款，会首先消耗外汇储备，而不是自己的海外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一个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和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也会出现问题。

“三元悖论”是经济学家们再熟悉不过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一个国家里，固定的汇率，开放的资本账户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不能同时满足。在金融业还有一个等效的说法，即资本流动与金融稳定无法同时满足。俄罗斯当前的国际安全问题非常突出，而资本的自由流动将会引发更大的动荡。

类似的事件曾经在一战爆发前上演。当时法国和德国之间密切的外交关系促成了大量资本的流动，但国际局势的紧张(如 1911 年的摩洛哥危机)所带来的投机性攻击使得德国被孤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尤其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当国际安全秩序瓦解时，投机性攻击成为政治操纵的工具。特别是，纳粹德国希望通过对法国施加金融压力来诱发信贷和预算危机，从而迫使法国减少军费开支。二战后建立的全球秩序的特点之一，是经济和安全治理系统之间要相互制约。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五大国家同时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会成员，这有助于避免政治性的投机性攻击，恢复全球金融和货币的稳定。

3、俄罗斯的处境

苏联没有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过俄罗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授予了一个执行董事会的席位，进而被列入八国集团(G-8)和新组成的二十国集团(G-20)之中。但是八国集团暂停了俄罗斯的成员国地位，最近在布里斯班举办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中，俄罗斯被降级为观察员的身份。简而言之，世界秩序正在重建，俄罗斯正逐渐失去地位。

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曾期望产生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这种机制由新兴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主导。所谓的金砖四国将挑战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做到了，但是目前来看效果还不太理想。

例如，据报道，俄罗斯与中国在去年 5 月签署的大型天然气供应协议是以人民币和卢布计价的，而不是美元。但是因为卢布暴跌的关系，这些条款可能需要重新谈判。同样，在 7 月，金砖国家共同成立了应急储备安排协议以“应对短期国际收支压力，提供相互支持，并进一步加强金融稳定”，但对身陷危机的俄罗斯来说利用这个紧急信贷额度似乎不太可能。最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承诺会援助俄罗斯，但他含糊不清的说法反映出中国犹豫不决的态度。

总之，不论是西方主导的治理机制，还是尚未完善的金砖四国治理机构，都已经转向孤立俄罗斯。在这一点上，俄罗斯唯一的希望是这场危机能够引发严重的动荡，并蔓延开来，使投资者和新兴经济体感到不安，并最终引爆全球治理体系。

本文原题为“The Global Consequences of Russia’s Isolation”。本文作者 Domenico Lombardi 为 CIGI 全球经济栏目主任，Harold James 为 CIGI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5 年 1 月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重返亚太 2.0 版

——从选举、议会等视角对美国下一步亚太策略的分析

Michael J. Green, Victor Cha 和 Bonnie S. Glaser 等/文 唐靖茹/编译

导读：意见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亚太地区是美国利益的重中之重，多数亚太问题专家支持奥巴马执政目标中“重返亚太”和“再造平衡”相关内容。然而面临 2014 中期选举失利，预算难以通过，以及乌克兰、伊拉克、伊朗问题围困等重重压力，关于奥巴马是否还能维持“重返亚太”计划的质疑陡升。在古巴移民政策等问题方面，奥巴马政府与新一届国会持对立态度，但亚太问题政策却是两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最大共识。因此白宫和共和党领导人是否能在今后两年就亚太问题上达成共识意义非凡。本文概括内容包括贸易、中国、防御、朝韩、印度和东南亚等相关问题。编译如下：

1、巩固泛太平洋伙伴关系

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是本届美国政府“重返亚太”方针中的核心部分。TPP 将创造美国参与的最大自由贸易区，将为亚太地区设立一套现代化的商业准则，同时也将加强美国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如今 TPP 谈判已接近尾声，虽在 2014 年因美日市场准入问题推进速度有所减缓，但解决机制已近在眼前。

依照美国制度，国会通过行政部门法案后自由贸易协定即告生效，是由争取政治支持到完成整个流程的最后一步。总统的领导力和领导力是决定成功与否以及调和政治矛盾的基础。

11 月中期大选中，新晋参议院多数党党魁及议长表示将就 TPP 等贸易协定与总统进行合作。总统必须参与政策制定，强调其对于经济和国力的重要性，管理党内政治，争取共和党多数支持，对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表现出充分的政治共识。

以往较为有成效的方法是将立法进程提前，阐明优先级，加快两院的研究进程，这被称为贸易法案快车道。这在程序化实施法案中非常有用，但立法本身也是为了在国会成员中和在民众中最终赢得对执政党贸易政策的支持，同时也让贸易伙伴感受到诚意。一般而言 TPA 立法过程为半年。两党均会为连立法案作出努力，立法者将平衡总统与国会的政治倾向。

即使是在晚期，TPA 的成功也将催化最终谈判。让我们期待 2015 年中期 TPA、TPP 能够在秋季敲定并呈送国会。

2、中国：建立互信、设置期望

再造平衡的成功实施取决于两国共识：如果东亚失去秩序，任何一国都无法掌控未来秩序。虽然两国领导人都认可这一公理，但均未表现出对“零和博弈”的

否认。要改变这种格局，政府应该在以往的优势关系背后多投入精力，不要刻意回避由于中国国力增强所带来的影响以及阻碍因素。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性高，这在长期以来缓和了中美关系中的矛盾。虽然两国贸易投资额让其他国家相形见绌，但难以保证这种经济联系持续稳定，投资风险依然存在。政府和国会应该共同安抚中国投资者，减少律法限制和特定领域准入限制。

政府也会更多地看到中国政界的一种普遍心态，认为外国投资者需要中国市场更甚于中国需要投资。这种想法可能使中国做出一些不利行为，政府应该从整体协调的角度来回应这些行为。

习近平主席要求发展重点更多地放在党政机关而非政府，这一点也值得注意。习近平领导的新一届领导人管理着美国重视的安全、经济和网络安全等重要部门，美方也应尽快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中美党派间的交流也有益于制度建设。

军事方面，借鉴良好的军事协定先例，美中应于 2015 年签订空对空作战附属承诺，并在多样化领域建设双边关系和监督机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磋商，扩展《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也能减少风险。

在中国东南海地区，政府应该发展跨部门计划鼓励中国加入到协调合作、缓和紧张局势的行动中，使破坏稳定、高压政策的行为付出代价。

伴随中国国力增强的是对人权问题的漠视，美国应该继续追求价值导向的对外政策，团结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拥护者对中国当局施压。

美国利益在中国乃至更广范围的地区，都将得益于美国与亚欧伙伴们的联盟。

3、防御：为再造平衡提供理由与资源

虽然支持重返亚洲的力量甚巨，但其缺乏统一的战略目标和资源。例如在中国问题上的前后矛盾导致失去了一些国会支持和军事资源。为了使各项方针政策统一，2015 年国家授权法案要求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亚洲战略报告，规范冷战以来直到中国崛起时期的东亚战略。虽然政府一直抵触这一要求，但这能够帮助建立与国会的桥梁，并减少不确定性。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国会应该准备批准升级关岛等太平洋区域军事设施的预算以维持控制实力。

没有充足资源，领导人必须在维持已有实力和升级实力之间做选择，而中国等竞争者均在升级力量，美国军队也必须这样。面临预算压力，对未来风险的防御更为重要。显示自身的长期稳定性既有利于结盟，也有利于瓦解潜在敌手。

4、未来两年的朝鲜半岛

美国很有可能见证朝鲜接下来的核武器发展，这种挑衅可能是针对下一轮美韩军事演习，联合国安理会人权控告或是美国应对朝鲜网络攻击行动。

政府应该做出充分准备以应对核威胁，包括升级防御系统，联合韩国等。维持韩国长期国家安全是关键准则，这需出于韩国政府的利益而非向美国示好。

政府也应尽力修复日韩关系，日韩双边关系和美日韩三边关系应该成为在亚洲地区最可靠的资源，这也是促成美中关系和地区和平的因素，有利于使中国遵从规则而非使用修正主义。

另外，政府应与朝鲜网络攻击做斗争。最后，政府应该看到防御、威胁、非核化政策之外的新因素——人权问题。

5、Narendra Modi 政府：德里新气象

美印关系近来发展很快，新总理领导的政府乐于参与美国的亚太计划，伙伴关系更加牢靠。但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期望，例如弥补上届政府的短视经济造成的损失，防止双边关系议程偏题，对缺席 WTO 促进协定负责。

一些经济议题进展顺利，例如减少外国投资限制，税收等。知识产权方面也有一些进步。

国会在这—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首先国会需支持 Ashion Carter 担任下一任国防部长以促进联合防御关系，其次国会领导人应该更积极地支持与印度深层次的战略关系，另外还需保护我们的企业不受无端商业威胁。国防部也应该活跃于上述方针中。

美印关系应以十年的增量来考量，更紧密地在亚洲战略上结合。

6、东南亚

- 缅甸：首先应当培养支持美国的势力，建立政治党派，加强议会政治，准备监测 2015 公开选举。其次，有可能的话支持联合政府和军政势力之间的停火协定。
- 印度尼西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为美国私有部门参与提供机会。
- 越南：奥巴马总统应该计划在 2015 年访越以推动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走向新高潮。
- 泰国：继续监测政变后的发展，需找机会与这一老朋友再会。
- 中国南海：南海争端将是分水岭，对东南亚长期稳定和美国平衡计划意义重大。应该坚持立场，反对中国的非合法声明，同时支持东南亚几国海上占领、巡逻和威慑能力。支持原告国在陈述中占领道德和法律制高点以对抗中国。

7、结论

- 尽快启动总统竞选活动，争取公众和议会支持，在 2015 年夏季前通过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必要的贸易促进权。

- 实施已敲定的中美互信建立措施以及推动双赢的地区制度建立，例如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在中国实行高压政治和削弱政策时清晰地阐明损失。
- 发布东亚战略报告，明确再造平衡的目标。资助必要的军事建设，在太平洋地区重组美军，这意味着尽快通过预算。
- 加强美韩能力，抵御导弹威胁和网络攻击，努力提升日韩关系，将人权问题纳入到对朝鲜的统一方针中。
- 确保与印度的新防御框架协议包含对未来防御关系的新愿景以及阐述。国会领导人，除核心会议以外，必须更加重视与印度的关系，特别是要尽快恢复双边投资协定对话，扩宽美印在亚洲包括阿富汗地区的协作。
- 在 2015 年缅甸选举之前发展民主建设支持势力；使美国-印尼全面伙伴关系更加制度化；安排总统访问越南；集结国际和地区力量支持仲裁法庭裁定菲律宾案件，反对中国在中国南海地区关于九虚线的主张。

本文原题为““Pivot 2.0”How the Administration and Congress Can Work Together to Sustain American Engagement in Asia to 2016”。本文作者 Michael J. Green 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亚洲项目主管并领导相关交叉主题研究，Victor Cha 是 CSIS 高级顾问及朝韩问题首席，Bonnie S. Glaser 是亚洲问题高级顾问并负责 Freeman 讲席中国研究，Matthew P. Goodman 在 William E. Simon 讲席主讲政治经济学，Murray Hiebert 是 CSIS 高级研究员和 Sumitro 东南亚研究副主管，Christopher K. Johnson 是亚洲问题高级顾问并负责 Freeman 讲席中国研究，Scott Miller 是高级顾问并负责 William M. Scholl 讲席国际商务研究，Richard M. Rossow 是高级研究员并负责 Wadhvani 讲席美印政策研究，Nicholas Szechenyi 是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日本讲席的副主管。本文于 2015 年 1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2014 年中国汇率与资本账户改革措施回顾

Kent Troutman/文 黄杨荔/编译

导读：本文从“沪港通”等新政策的实施、人民币国际化、储备资产管理等方面，对 2014 年中国汇率与资本账户改革措施进行了简要回顾，并提出了 2015 年改革展望。编译如下：

1、2014 年关键改革摘要

- 一些新政策得以实施，包括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扩大、沪港股市的互联互通，以及对银行外汇管理管制的放松；
- 对内/外直接投资绑定配额、个体对外投资计划均有所增加；
- 储备资产规模增速显著放缓，外汇市场双向波动增加；
- 人民币年均汇率不及官方目标，并以年度贬值 2.5% 的水平收官，尽管人民币的贸易加权汇率继续升值；
- 随着新的人民币离岸中心落座欧洲、国外资金获得重大扩展，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所推进。

2、政策概览

2014 年初我们注意到，全球周期性力量或将有助于中国推进资本账户与外汇政策改革。我们认为，2014 年将是重要的转折点——中央逐步放松了对人民币的管制，并在资本账户开放上取得进步；中国推行的强烈干预和储备资产累积政策可能会在这一年结束，因为该政策的继续实施越来越困难，成本也愈发昂贵。然而，年初时来自中南海的承诺使得上述预期前景黯淡。

在 2014 年初李克强总理概述年度优先改革领域的讲话中，外汇和资本账户改革明显不受重视，年初时储备资产也有增无减。然而 2 月底，人民银行下调人民币官方汇率，并且直接干预外汇市场，此举令市场大为吃惊——此前人民币持续升值。结合贸易收支恶化、投资放缓的背景，这一官方举措引发了市场对人民币走势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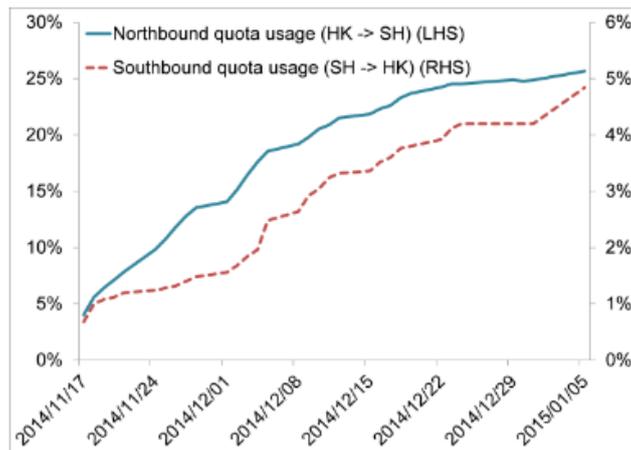
或许利用了上述措施带来的不确定性，人民银行将人民币汇率日浮动区间上调至 2%。然而，正如我们在此前一份报告中所指，只要中央拥有设定人民币报价均价的权力，这一政策变化对推进人民币自由化并无多大帮助。另一方面，中央正以其他方式增强市场在人民币定价中的作用。2014 年 12 月底，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解除对银行外汇风险的限制，并取消了国内外汇市场上的多项规定。然而，由于国有银行本身豁免于外汇风险限制，对外汇空仓的需求也暂时有限，这一公告的实际作用可能微乎其微。不过这表明，政府与外汇市场相处愉快，是个好信号。

2014年，中国授予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2500亿元（合420亿美元）的配额，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追加的数十亿元也得到批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获得了370亿美元的配额，而截止2013年底，该项目累计总额仅为30亿美元。另一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项目上新增310亿美元配额。此外，人民银行于11月公布了更多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计划（RQDII）和个人对外投资方案计划（QDII2）。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投资计划均以配额计价，其实际使用方法将是多样的。而且，尽管从百分比上看配额增加了很多，但相对GDP而言仍然很少（不及10%GDP）。

除了直接投资计划，香港和上海股市的双边互通计划于4月公布，并在11月得以实施，该计划约占3000亿美元境内配额。该计划最初的表现令人失望（见表1），尤其是中国投资者在港投资情况。据报道，这源于外来基金经理参与香港股市的管理困难。然而，抛开这些最初的路障，“沪港通”和预计将于2015年下半年推出的“深港通”计划，将改变迄今为止中国股市与全球经济相对脱节的状态，并为中国投资者提供更广泛的多样性投资。

最后，尽管国务院起初暗示上海自贸区将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该设想仍有待实现。不过，政府反复强调其对上海自贸区的承诺，并提出在广东、福建和天津增设三个自贸区。

表1“沪港通”配额使用情况（以总配额百分比计）



来源：Wind

3、人民币国际化

无论从提高人民币海外使用度的狭义目标，还是增强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影响力的广义目标来看，2014年都是相对成功的一年。中国在欧洲开设了两个

人民币离岸中心，并在韩国开设了一个。伦敦和法兰克福的人民币中心将处理贸易结算，并充当人民币投资项目的清算行；而离岸交易中心在韩国的建成将增强中国对韩国经济的影响。中国还宣布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该机构或将与世界银行等其他国际机构竞争。美国放弃加入该银行。

此外，中国对阿富汗、阿根廷、委内瑞拉提供了关键的金融援助，未来还可能支援俄罗斯。以阿根廷为例，中国主要通过人民银行与阿根廷央行间货币互换的方式进行援助，有效允许了阿根廷进口商直接使用本地货币兑换人民币，否则他们将不得不转向供不应求的美元。据媒体报道，中国对俄罗斯的金融支援可能采取同样的方式。尽管这些援助不可能减轻俄罗斯、阿根廷面临的金融挑战，通过双边贸易，这些举措至少提高了人民币的使用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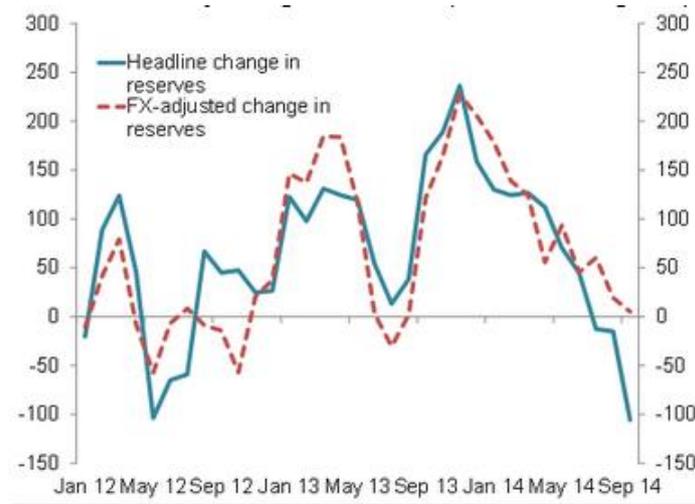
我们在 2014 年 5 月的政策简报中指出：中国的离岸人民币资产达 3000 亿美元，而人民币债券和股票资产总额不及全球总额的 1%，美国则占全球总额的一半左右。尽管这些离岸中心的开放无法使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发生实质性改变——比如成为挑战美元的“储备货币”，但这有助于全世界接触人民币，也使中国难以回到过去强烈干预的管理体制。

4、储备资产

2014 年初，中国储备资产增速与 2013 年相近。截至第三季度，储备资产共增加 600 亿美元（总额达 38800 亿美元），大部分来自第一季度。此后，储备资产仍有小额增长，月度银行外汇储备数据显示该增长持续至第四季度（见表 3），其中，持有的美国资产即便稍有下降，全年仍较稳定，约占 18100 亿美元。10 月份，持有的美国国债下降近 200 亿美元。撇开美国国债的抛售来看，储备资产的缩减速度与政策干预度下降及其多元化趋势的延续较为一致（见表 4）。尽管人民银行可能不再是美国国债的需求来源，因为中国一直在为本国投资者开拓海外投资渠道，但从长期来看，中国的私人投资者可能会填补这一角色，这将通过资产类别得以显现，包括对美国股票的更大需求（中国的私人投资者比官方储备管理者拥有更高的风险容忍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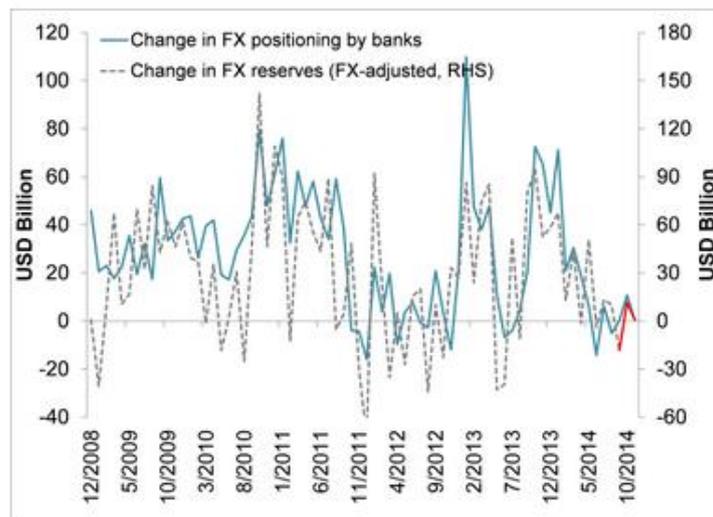
可得数据显示：2010 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将储备资产以非美国资产的形式多样化，主要投资于日本、韩国和欧洲市场。然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13 年中国在日证券投资总额几乎减半（由 2012 年的 2850 亿美元降至 1660 亿美元），从占比上看甚至超过一半（由外汇储备总额的 8.6% 降至 4.2%）；另一方面，中国在韩证券投资总额在 2013 年增长了 26%，2014 年增长了 21%，但仍仅占外汇储备总额的 0.5%。

表 2 储备资产月度变化（3 个月波动总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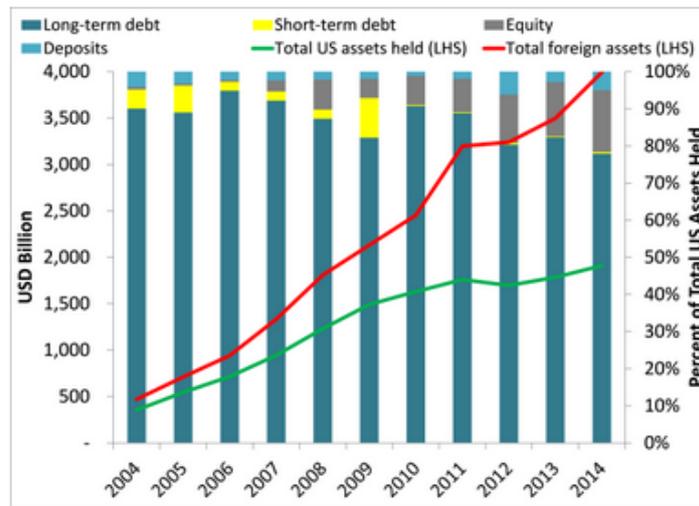
来源：人民银行、彭博数据库、IMF 数据库及作者计算

表 3 外汇储备与外汇头寸月度变化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人民银行、IMF 数据库及作者计算

表 4 2004-2014 年中国持有美国资产组合总额



来源：美国财政部、人民银行、IMF 数据库

5、观点

经历 2014 年初人民银行干预举措的磨练后，投资者们更加关注宏观经济，不再像从前那样固守人民币升值的信念了。正如我们在此前一份报告中所指，人民币已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交易手段了。然而，自 3 月份扩大交易区间后，人民币平均交易汇率不及官方目标，反映出市场黯淡的预期。事实上，在过去一两个月里，上述两种汇率罕见地反向运动（见表 6），即官方汇率升值、市场汇率趋于交易区间下界。

的确，这可能部分源于美元的普世力量及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怀疑。我们在表 7 展示了基于贸易加权的人民币汇率及名义汇率。2014 年第四季度，在 G3 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与避险资金流动的背景下，美元相对广义货币指数强劲升值，缓解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表 5 即期汇率与官方汇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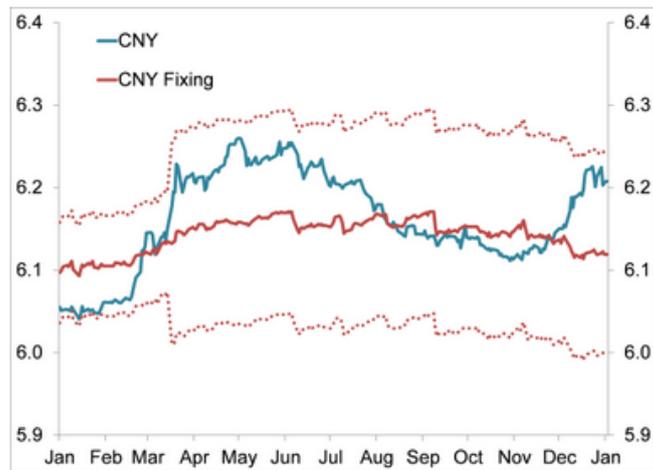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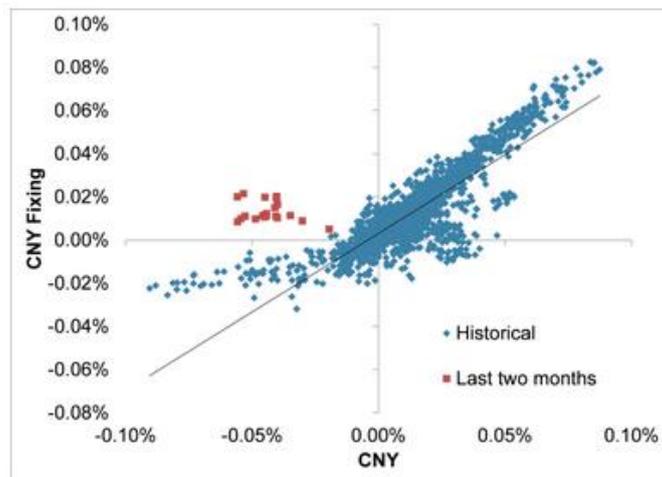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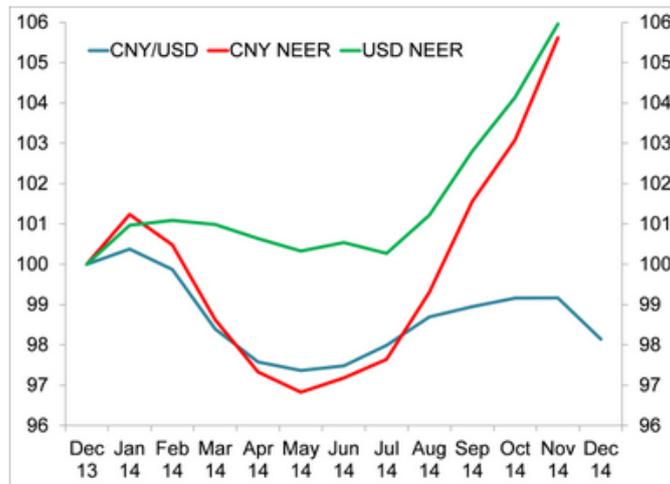


表 6 即期汇率与官方汇率日变化趋势（以 30 天平均变化计）



来源：彭博数据库

表 7 基于贸易加权的 RMB、USD 及 CNY/USD（以 2013 年 31 日为基准）



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6、2015 年展望

2015 年，我们期待这些改革的持续，尤其希望看到人民币自由兑换在上海自贸区完全或部分实现的实际时间表，这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人民币自由化。

对人民币而言，2015 年初是个有趣的时点。人民币汇率触及交易区间下界，而美元不断走强，因此人民银行可能选择：1、出售美元来增强人民币；2、下调官方汇率；3、扩大交易区间。或许人民银行将“三管齐下”，但我们认为，如果当前的市场情绪持续下去，人民银行不太可能再次扩大交易区间。

最后，我们希望看到关于 RQDII 和 QDII2 规模及时间表的更多阐述，这有助于境外投资的进一步开展。允许更多私人投资者（无论通过 QDII2 直接投资还是通过 RQDII 间接投资）拓展至外国资产，将有助于抑制地方性不良投资。

本文原题为“2014 Year-end Review of Exchange Rate and Capital Account Reforms”。本文作者 Kent Troutman 为 PIIE 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1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发展中国家借助贸易互惠协定突破改革瓶颈

Leonardo Baccini, Johannes Urpelainen /文 肖诗阳/编译

导读：从 1990 年到 2009 年，超过 500 个不同类型的贸易互惠协定（PTA）在各个国家之间签订。本文试图证明，要理解最近一轮贸易互惠协定浪潮的动机与结果，关键在于对这些贸易协定带来的“非贸易改革”效果的认识。本文认为，通过与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签署贸易协定，发展中国家可以促进国内争议性改革的通过与实施。编译如下：

最近二十年里，世界各大经济体之间签订的贸易互惠协定（PTAs）数量急速上升。根据 Desta dataset 的统计，从 1990 年到 2009 年，各国之间制定的各类贸易互惠协定超过 500 份。为什么这些国家愿意接受一些要求它们在国内推行困难而有争议性改革的贸易协定？同时这些条款是不是真的促进了这些国家内部的改革？尽管关于这些贸易协定签订之动机与结果的文献已经有许多，但其中很少有文献关注到这些贸易互惠协定带来的“非贸易性”结果。

我们出版的书籍《斩断经济改革的戈尔迪之结》指出，要真正理解最近贸易互惠协定热潮的动机与作用，应当重点关注这些协议对非贸易性质的改革的影响。发展中国家通过与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签订贸易协定去促进国内争议性改革的通过与实施。

1、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协议与经济改革

对于一国领导人而言，如果他/她希望在国内开展经济改革，但是受到了来自国内政坛反对力量的阻挠，那么他/她将面临一个两难局面。无论是强力推动经济改革的实施还是被迫放弃，他/她都可能受到灾难性的政治或经济后果。这种情况下，与其他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签订贸易协定将有机会间接帮助其在国内推行改革进程。

首先，国际组织往往包含一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去加强一国经济改革承诺的可信性。譬如说，如果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未能实行 PTA 协定中规定的经济改革承诺，那么这个领导人就违反了 PTA 的要求。如果该 PTA 协定另一方为欧盟或者美国，作为对违反 PTA 协定的惩罚，它们有能力大规模停止向该发展中国家出口商提供贸易特许权。因此，美国与欧盟很愿意就一些包含有经济改革承诺的贸易互惠协定展开谈判，因为通过这些经济改革承诺，它们获得了干预合作国内部经济政策的能力。一国领导人如果未能履行其在贸易互惠协定中做出的承诺，他/她将承担来自欧盟和美国的惩罚举措，而这些惩罚性举措将导致其在国内付出高昂的政治成本。出于对这些高昂政治成本的权衡，领导人试图违约的动机就消失了。不仅如此，对于该国之后继任的领导人来说，他们同样继承了这种政治成本考虑。

第二，国际组织可以帮助一国领导人争取到国内经济改革的政治支持。如果缺少了国际性组织的支持，而国内因这项经济改革而利益受损者的声音又高于那些可能从改革中受益的人，那么这项改革势必将难以进行。相反，如果这项经济改革措施能获得来自国际组织的支持，将使得赞成者获得更多力量。如果由于缺乏国内的经济改革，某国家和国际组织签订的协议无法落实，可能会导致这些国际组织暂停对国内选民带来的一系列利益。因此，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可以战略性地利用这些国际机构去推动国内改革的进行。

这个思路在南非民主化转型及纳尔逊·曼德拉领导下的最初几年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曼德拉面临极大的经济增长压力，而政府联盟内部对于究竟采用何种经济政策却存在极大分歧。举例来说，就业增长与再分配是刺激疲软经济体复苏的重要策略之一，但是这一策略却受到了来自南非贸易联盟和南非共产党的强烈阻挠。不过，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叶南非和欧盟之间签订的贸易协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这项改革实施所遇到的阻力。事实上，自从欧盟和南非之间的贸易协定正式签署后，来自欧洲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量在南非显著增加。这些外商投资直接帮助南非，尤其是南非黑人族群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同时也帮助黑人群体在后种族隔离时代获得了更多的资源配置。

和主要经济体签订贸易互惠协定是非常有益的。尽管表面被称为贸易协定，但是这些和美国、欧盟等签订的条例中包含了要求强化合作方国内经济改革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扩大专利保护力度、处理好外国投资人之间的利益纠纷、同时向欧洲及美国银行开放资本账户等等。除非发展中国家遵守这些要求，否则它们将无法通过在欧洲和美国获得更广泛的市场准入而得到收益。同时，无法遵守协定中的要求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自动放弃不断提升的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利益。一直以来，由于欧盟和美国都乐于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贸易自由化，因此和它们展开贸易谈判的机会一直开放。这也直接使得贸易互惠协定谈判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促进国内经济改革的有机手段。

2、南北协定的构成

为了证实我们的理论，我们试图分析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更替、国内民主化程度及这些国家和欧盟及美国之间开展贸易互惠协定谈判的关联。在这本书的理论分析部分，我们假定领导人的更替速度与该国内改革困难程度成正比。同时一国的民主化程度，平均而言，将加大领导人寻求经济改革的意愿。新领导人往往政基不稳，因此难以推动有争议的改革。而民主化，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国内对于自由化改革以及经济改革的诉求。

假定了上述条件后，我们预期领导人更迭与民主化程度将加大一国开展贸易互惠协定谈判的概率。为此，我们使用了 140 个发展中国家从 1990 年到 2007

年的数据。而得到的结果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经验证明。领导人更迭和民主化程度对于开展贸易互惠协定谈判的概率有极大的正相关性。不过，如果我们以发展中国家和非欧盟或美国的贸易互惠协定为研究对象，这个结果就消失了。

同时，我们对四个案例的定性分析也强有力的佐证了我们的定量分析。以克罗地亚为例。在弗拉尼奥·图季曼死后，克罗地亚成为议会民主制国家，但是由于民族主义、内战困扰以及国内经济衰退的原因，克罗地亚的民主化进程并不顺利。新选举上台的克罗地亚政府决定与欧盟签署贸易互惠协定，这对于这个只能依赖内部高度分裂的支持者以及面临经济改革困扰的新政府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决定。克罗地亚经济改革的困扰原先主要来自于该国受益于前总统图季曼权贵私有化制度的利益既得者。经过十年高速增长的经济以及一系列重要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克罗地亚在 2013 年 7 月 1 日正式加入欧盟。

3、结论与评论

在一定的条件下，双边互惠协定可以帮助一国领导人实现他们希望在国内推动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尤其是微观层面的自由化改革。当一国领导人试图开展经济改革，无论是对政敌的财富进行再分配还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他都会受到来自利益既得者的强力反抗。即使是政局稳定的时候，经济改革也是困难的。正如同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和美国以及欧盟的贸易互惠协定将帮助一国领导人同时解决两个问题。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贸易互惠协定对于经济治理的作用远远超出贸易的范围。发展中国家通过和欧盟及美国建立贸易协定去促进国内的经济改革，这一方式已经被证明有效。在未来，相似的策略可以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效仿。

本文原题为“Preferential trading agreements: Helping economic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本文作者 Leonardo Baccini 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方向副教授，另一位作者 Johannes Urpelainen 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本文于 2015 年 1 月 9 日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东亚地区 FTA 对贸易的影响

Misa Okabe /文 刘兴坤/编译

导读：虽然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起步较早，但直到 21 世纪之前，东亚一直被称为“FTA 真空”。进入 21 世纪之后，东亚自由贸易协定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其贸易效应的关注。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本文运用更详尽的数据，对东亚现存的 5 个 ASEAN+1 FTA 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实证分析，并得出了若干有意义的结论。编译如下：

根据 WTO 区域贸易协定 (RTA) 数据库统计，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快速增加，截至 2014 年 6 月达到 585 个。区域贸易协定迅速崛起的一个原因是，随着成员国数量日益增加，WTO 框架下的全球贸易自由化谈判陷入僵局。为此，许多国家转而签订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一方面通过削减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寻求贸易创造效应和市场扩张效应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通过 FDI 自由化和技术转移获得诸如资本积累、生产力提高等诸多动态经济效应。

1、东亚地区 FTA 发展迅速，贸易促进效应显现

跟随区域贸易协定 (RTA) 的世界发展趋势，进入 21 世纪之后，东亚地区的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 (FTAs) 迅速发展。尽管东亚开创性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区域性 FTA (1992 年成立了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但后续签订却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东亚一直没有国家加入区域性或区域之间的贸易优惠协定，例如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全球贸易优惠制度和亚太贸易协定。但是，2005 年以后，东亚双边 FTA 迅速发展，相继签订了 5 个 ASEAN+1 自由贸易协定，即 ASEAN-中国 FTA (ACFTA)、ASEAN-日本 FTA (AJFTA)、ASEAN-澳大利亚-新西兰 FTA、ASEAN-韩国 FTA (AKFTA)、ASEAN-印度 FTA (AIFTA)。目前，东亚国家签订的 FTA 数量已超过 60 个。此外，诸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之类的更广泛的 FTA 谈判正在进行。

21 世纪以来，随着东亚地区 FTA 数量的增加，区域贸易和 FDI 规模不断扩大。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区域内贸易比重没有明显变化，但是绝对额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不断增加，并从 21 世纪初开始实现爆发式增长。这反映了东亚向区域外出口的增加以及区域内贸易的扩张。ASEAN 成员国的对内 FDI 随着东亚国家对内 FDI 比重从 21 世纪开始提高而提高。因此，从定性角度来看，东亚区域性 FTA 的增加对区域内贸易和 FDI 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这需要进一步的定量分析。

2、关于东亚地区 FTA 的贸易效应的先行研究

本文回顾了东亚地区 FTAs 影响的事后评价。关于东亚地区第一个区域性 FTA（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所产生影响的早期研究显示，20 世纪 90 年代 AFTA 的贸易创造效应并不显著。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许多研究运用详细的产品或部门的贸易和关税数据证明，AFTA 框架下的关税削减促进了 ASEAN 成员国家之间的区域内贸易。近期研究也显示，在 AFTA 框架下，关税削减不一定是促进产品贸易的最重要的措施，而诸如非关税壁垒废除、原产地规则的贸易促进与协调、FTA 可操作性改善等自由化措施在促进成员国贸易方面更为重要。同样地，对于东亚地区的双边 FTA 来说，一些相关事后研究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对贸易产生正效应，并进一步指出，在 FTA 框架下，不仅关税削减而且其他自由化措施对贸易的促进效应都是显著的。但是，限于数据可得性，对东亚地区 5 个 ASEAN+1 FTAs 影响的实证研究尚不充分，为此，本文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

3、详细数据分析得出东亚 FTA 的若干新特征

运用 2002-2012 年期间的部门贸易数据，本文研究发现了东亚地区 FTAs 存在的若干特征。ACFTA 和 AKFTA 的贸易创造效应发生在东盟国家与中国或者韩国之间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贸易。同时，ACFTA 还促进了所有成员国之间的消费品贸易。这些结果表明，每个东亚 FTA 都通过区域内发达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促进了区域内贸易。此外，ACFTA 和 AKFTA 还增加了柬埔寨、越南等 ASEAN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供给和资本品贸易。这意味着，东亚区域性 FTA 在将既存的生产和销售网络向新型发展中成员国家扩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然，日本和 ASEAN 国家之间在更早的样本期间内形成了广泛和深入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但是 AJCEP 并没有产生像 ACFTA 和 AKFTA 那样的在多部门和国家之间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日本与 7 个 ASEAN 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 FTAs 比 AJCEP 更活跃。这说明，在已签订 FTAs 的这些成员国家之间增签一个新的双边 FTA 的自由化程度应该更高，或者比将已签订的 FTAs 整合成一个有效率的区域性 FTA 所产生的使用成本更低。

尽管为了得到更精确地结论，有必要进一步更新数据，以包括所有已完成的关税削减计划所包括的样本区间。但是本文的估计结果已显示，在较早的样本期间内，在许多部门，东亚地区的 5 个 ASEAN+1 FTAs 对区域贸易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且，贸易创造效应似乎源于 ASEAN 国家与其谈判伙伴国之间所形成的生产和销售网络。预期这些 ASEAN+1 FTAs 将继续促进中间产品、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区域内贸易。

分析每个 ASEAN+1 FTA 所产生的这些贸易创造效应的动态演变也是很有意义的。长期来看，东亚地区通过区域性 FTAs 所形成的自由贸易体制需要发展区域内生产和销售网络，并有助于缩小区域内经济发展差距。这样的区域性 FTAs 将有助于扩张有效率的劳动碎片化分工。因此，区域性 FTAs 的成立不仅要最大限度地削减关税，而且要促进服务贸易和 FDI 的自由化进程。此外，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与既存的 ASEAN+1 FTAs 相比较，新型区域性 FTAs（如 RCEP）应实现更高水平的自由化，以使得更多的廉价生产过程也能够适用 FTA。

本文原题为“Impact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on Trade in East Asia”。本文作者为日本和歌山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本文于 2015 年 1 月刊于 ERIA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打造亚太地区的核治理：下一个重大课题

David Santoro, Carl W. Baker/文 郭楚/编译

导读：当前，关于亚太地区核治理问题存在多种不同层次的合作机制，对地区核治理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却由于机制的重叠和“碎片化”问题制约了核治理效果的进一步提升。作者认为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以提高核治理机制的统一化和一体化，最终切实根本加强地区核治理能力。编译如下：

俄罗斯削减与美国在核问题上的合作以及做出不参加2016年核峰会(NSS)的决定是国际核能安全治理进程的一个倒退。乌克兰危机已导致美俄关系的倒退，而俄罗斯的这一决定将进一步恶化美俄过去20年里在核不扩散领域已取得的成功合作，这些努力都是为了防止核武器、原料和技术等落入恐怖分子手中。自2010年首次召开以来，核峰会已经在促进国际核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由于俄罗斯的决策）现在这一努力的效果已被削弱。

尽管俄罗斯的这一决定断然不可取，但是国际社会仍然要将精力集中投入到核治理问题上，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尽管经历了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但亚太地区对核电站的兴趣不减反增，地区受到放射性原料威胁的安全问题变得严峻。对于一个有着几个核武国家的地区来说，这一情况是让人担忧的，尤其是有些国家还存在非法交易网络，且恐怖主义、破坏势力和海盗行为不断。

幸运的是，近年来亚太地区合作应对核威胁的意愿正在上升。除了旨在打造东南亚无核区的曼谷协定（Bangkok Treaty）得到实施以外，东盟还加强在核不扩散和反恐问题上的合作。2012年东盟原子能监管机制网络（ASEAN Network of Regulatory Bodies on Atomic Energy）的创立，为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在核安全和防护等问题上搭建了信息共享和打造能力建设的对话论坛。自2009年以来，由东盟及其周边地区的27国参加的东盟地区论坛组织召开了“防扩散和裁军的休会期会议”，集中讨论应对核扩散、推动裁军和提高和平使用核技术的办法。东盟地区论坛还组织了关于执行联合国安理会1540号决议的研讨会，这一决议旨在要求国际社会完善和施行法律法规以防止核扩散和推进核问题合作。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地区组织已开始着手推动核能利用规范和标准的建设。亚太经合组织、“ASEAN+3”就地区核能合作问题正在酝酿可行方案。

亚太地区各类组织自上而下的领导力与地区各类核倡议机制彼此互相补充。由关心核安全问题的政府、基金会和公司资助的“世界核安全研究所”（World Institute for Nuclear Security）在世界范围内为共享有关加强核原料、核设施的物理保护实践搭建了对话机制。通过开展对核辐射、反应堆和核安全设施的项目研究，由日本牵头的“亚洲核合作论坛”（Forum for Nuclear Cooperation in Asia）为

和平使用核技术提供了合作框架。与国际原子能组织一道，亚洲核安全网络（Asian Nuclear Safety Network）致力于集中分析与共享核安全信息，与此同时，亚太区域合作协议（Asia-Pacific Regional Cooperative Agreement）力促联合研究，开发和打造有关核科学和技术的项目。亚太安全网络（Asia-Pacific Safeguards Network）加强与有关政府当局和机构的合作，促进成员间核安全措施的落实。最后，最近由中日韩（以及其他有关亚太国家）成立的核安保示范中心（nuclear-security centers of excellence）开展了提供有关核安全的培训和教育的活动，以保证核安全、核防护措施是可持续发展的。与一些资助项目（主要由美国、欧盟及一些相关国家提供）一道，这些倡议和机制将塑造和维持亚太地区的核安全和防护文化。

这些机制和倡议总体来说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却呈现碎片化、无组织的形式。这些倡导机制需要被整合进入一个框架内，以避免重复建设的资源浪费，发挥比较优势和规模优势。简单来说，就是亚太地区的核治理需要加强机制化建设。这将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过程。不管未来的组织结构和构成是怎样的，提高核治理首先需要成功地处理几个重要的合作预期。亚太核能专家组安全合作理事会（Nuclear Energy Experts Group of the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一个由地区核安全政策的专家学者组成的非官方核治理对话机制，指出了四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行动的责任是落实到国家上的。地区核治理以国家间缔结和达成核安全和防护的国际条约、协定和惯例为开端，即《核安全公约》（Convention on Nuclear Safety），《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hysical Protection of Nuclear Material）及其修正案，《制止核恐怖行为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Acts of Nuclear Terrorism）。越来越多的亚太国家加入了这些法律文件，但很多还没有开展相应的动作。这是需要改变的现象。理论上说，国家应该做国家风险和威胁评估，以便更好地理解他们各自面临的核安全和核防护问题，找出重点，指导政策。应在三个核管理领域开展评估工作：使用和储备核和放射性原料的设备，原料的运输，核事件的危机反应应对机制。单个国家的这些工作是系统打造地区层次的核治理机制的前提。

第二，重点加强对无核国家放射性原料来源的管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这点相对容易做到，因为所有亚太国家都有这类材料，且在学习如何以安全的方式管理这些材料问题上有既定利益。但过分强调核能项目的管理也是应该避免的。只有少数国家（东北亚和南亚）拥有核能项目，而其他国家（东南亚）尽管已表达出对核能的兴趣，但在近期来看不会有（或极少）核电站投入运行。当然，深度的讨论有助于警醒这些核能使用国和潜在追求国。找到向这些国家提供前后端

反应堆燃料循环的最优选择，从而抑制其浓缩和再加工能力的发展，将尤其重要。随着地区国家在未来数十年将建造核能设备，营造浓厚的放射性原料安全管理文化应放在首位且将会产生积极效应。

第三，对核安全、防护和保护措施给予同样的重视。近期以来，全球层面的加强核安全治理的共同努力被一再强调，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这只是更大的核治理难题的一个方面，一个全面的整合核安全、保护和防护的机制仍然必要。换句话说，就是所谓的“3 个 S”（safety, safeguards, security）密不可分。亚太国家重视对核安全防护措施问题的合作，但却认为核政治安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因此将其列为秘密。

第四，对亚太地区能在短时间内开展深入合作的期待是不现实的。不干涉内政、协商一致的“东盟方式”决策方式是亚太地区合作的传统惯例，有助于地区国家建立互信和打造团结，但往往阻碍合作倡议发挥直接政策效果。例如，东盟原子能监管机制网络（ASEANTOM）在东南亚地区的核治理过程中只发挥了一个技术性角色，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的根本不同在于后者能在欧洲核事务中发挥决策性的作用。

尽管亚洲的事务不能用欧洲的办法解决，但在亚太地区仍有拓展创造性合作的空间。例如，东盟人道主义和灾害救援协调中心（ASEAN Coordinating Center fo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on Disaster Management）目前只关注自然灾害的救援，为何不将人为灾难也列入其议事日程？毕竟，无论是应对自然的海啸，亦或是应对非自然的核事件都将需要同样的合作和协调机制。扩大此机制的职能将有助于其成员更好应对这两种类型的事件。

我们必须观一木而见森林。近期俄罗斯在核治理问题上立场的倒退尽管让人忧心，但这不应成为对提升全球核治理能力的阻碍。俄罗斯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成功也能以不同方式达成。通过加大投入，亚太地区核治理的能力建设机制将逐渐成型并将可持续发展。

本文原题为“Building nuclear governance in the Asia Pacific: the next big project”。本文作者为美国著名智库 CSIS 学者 David Santoro 和 Carl W. Baker。本文刊于 2014 年 12 月 2 日 CSIS 官网。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两个故事的故事：亚太地区的博弈

Ralph A. Cossa、Brad Glosserman /文 郭楚/编译

导读：通过举办 2014 年 APEC 峰会，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实力举世瞩目，而美国由于受到内政外交的各种现实情况的制约，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地位被认为有所下降。作者认为，美国固然正在经历内政外交上的困局，但不应过分解读这是美国的衰落。同时，美国必须调整和完善政策，继续将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纳入到国际体系中，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美国领导下的国际治理，并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编译如下：

不知国际事务的观察者们是否仍然记得美国当年敦促中国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人们需要小心谨慎了。中国的习近平主席通过召开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展示了中国作为亚洲新兴大国的地位，同时向亚洲国家推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并呼吁早日建成亚太自贸区(FTAAP)这一首先由美国提出的倡议。一个美国驻亚洲地区的官员向两个报刊吐槽道：“我们在这儿走投无路了”，一是暗指中韩自贸协定的进展，另一个是蕴含了美国抵制亚投行的意味，同时似乎也反对由中国倡议迈向亚太自贸区的努力。

在亚太地区，类似这样的气馁和沮丧延绵不绝。奥巴马的亚洲之行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如果说还算成功的话，那么相比之下，中国在此期间的外交作为则更可以被看作是可圈可点的。中国的外交动作在外界看起来越来越突出进取和有所作为的特点，而美国却居于守势，努力去抵御中国提出议程的影响力，并争取赶上中国的节奏。与此同时，那些认为（其实是错误的观念）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是为了遏制中国的人也指出，美国的这些行为正好印证了他们的观点。

平心而论，上个月中国的表现十分抢眼。像举办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一样，中国为 APEC 会议投入了很多，所有相关的国家机器和资源都投入到了举办 APEC 论坛事宜中。习近平主席甚至通过与安倍晋三见面而一定程度修补了中日关系（至少是暂时和轻微的）。在与奥巴马总统的会谈中，两人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其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共识，这些协议和共识为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与奥巴马不同，习近平被认为能够遵守减排的承诺。而奥巴马则面临着国会的巨大挑战，被外界看来权威大减。

APEC 峰会和亚投行只是中国更大的权力和财富写照的部分展示。中国还有一些列的议程和倡议，如在亚信会议（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提出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Asia for Asians）安全观，新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金砖国家银行，

以及与韩国和澳大利亚的自贸协定等。这些并不是空对空的概念，而是具有实质内容。中国已承诺为亚投行注资一半，为金砖国家银行至少注资 20%，在印度投资 200 亿美元，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投入 400 亿美元。

与此同时，美国却处在守势。美国参加 APEC 会议期间，美国国内的报纸充斥着其将会抵制亚投行的言论，以逼迫同盟国和伙伴国与亚投行保持距离。美国也据说会抵制中国推动亚太自贸区的努力（为了避免干扰 TPP 的进程）：这种看法不管是否真实，但却使美政府当局展现出这样的国际形象，即美国没有能力塑造未来，而是消极抵制他国的影响力。

这些情况貌似展示了一幅美国僵化的政治体系和一个经历了国会中期选举失败的跛脚总统的图景。很多人已不相信奥巴马能再次重整旗鼓。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会的支持下，奥巴马也不太可能轻易获得用于快速完成 TPP 谈判的贸易谈判促进权（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奥巴马越来越给人一种弱势、优柔寡断、甚至是没有远大抱负的总统形象。美国公众已陷入一种思想上的分裂。国防部长哈格尔（奥巴马内阁唯一的共和党人）被迫辞职一事，与一种孱弱、衰落了的国家形象交相辉映，在那样的情境中，美国在崛起的中国面前苟延残喘地拼命维持着霸主的地位。

这种美国的国家形象与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形象截然相反。中国有强大的国家领导人，大力推进军队现代化进程，强力开展反腐工作，提高共产党的合法性地位，力争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追随着他（习近平）和他的远大理想。习近平主席还展示出了纠正错误的勇气，他意识到了过去 4 年中过于咄咄逼人的强势外交所造成的一些消极影响，并在最近几个星期做出了一些微调，通过语言和行动向周边邻国展示了友好。

然而，这种认知是扭曲的，它夸大了美国的问题和曲解了国内的发展。事实上，美国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增长率超过了 3%，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失业率第一次降到 6% 以下，预算赤字降低，出口增加。奥巴马或许处于守势，但他并非孱弱，最近他的作为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国仍保持着对亚洲的强烈义务，再平衡战略也继续推进。尽管美国大众不认可外交冒险主义，但是民调显示，公众仍明确认为美国应维持对世界的领导权。在需要行动的时候，公众会支持政府并献策献智。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继续超过美国，但这是正常的现象，毕竟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了 1/3，国内压力也增大：银行金融系统形势趋严，房地产泡沫严重，腐败行为虽然受到抑制，但其原因却是根深蒂固的，且会有给党造成更大损害的风险。北京的市民们谈论到的“APEC 蓝”现在却被严重的污染所代替。中国的邻国对它乐善好施的慷慨欣然接受，但

是却没有阻止这些邻国继续与美国强化安全关系，以抵抗中国愈发强硬的外交姿态，如在南海问题上。

美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或许看起来是利己的，尤其是与中国的慷慨相比，但事实上地区事务需要美国的存在和姿态。如果同盟和合作伙伴对美国的作为有所疑惑，那是因为他们对美国的期待更高。因此，在成立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的标准问题上，在如何确保它们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互补而不是竞争的问题上，美国有权发问。

无论如何，这些情况使美国的决策者感到忧虑。美国正在经历着公共关系争夺战的失败。认知与现实往往不一定相匹配，而且很多情况下，认知反而塑造现实。尽管公关与政策不能混淆，但是美国必须有所作为，以改变和重塑这种国际形象。例如，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能释放这样一种信号，即美国承诺和愿意吸收和接纳像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银行的成员，使他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获得与他们日益增长的国力和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相符的角色，而不是逼得他们另辟道路去创造一个替代性的体系机制。

对美国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共同塑造更好的国际环境。美国不应被外界认为是在反对中国（或其他政府）提出处理地区问题的倡议，也不应该被认为是小气和易怒的，不应被看成是只关心谁提出方案、而不关注解决问题的方案的效用。美国应该鼓励所有的国家都参与到解决 21 世纪的各种层出不穷的挑战中。否则，美国将继续被认为是孱弱的和被认为是在国际治理问题上的阻挠因素，而不是其自己仍然宣称的是世界的领导者。

本文原题为“A tale of two tales: competing narratives in the Asia Pacific”。本文作者为美国智库 CSIS 学者 Ralph A. Cossa, Brad Glosserman。本文刊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 2015 年对外政策预测

Tim Summers /文 高歌/编译

导读：新年伊始，学者 Tim Summers 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了题为 Chinese Foreign Policy: What to Expect in 2015 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归纳了过去一年中国外交的特点，对 2015 年中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预测，认为在新的一年里对外政策仍然是中国领导层的关注重点，强有力的外交和渐进地改革国际秩序的努力将是对外关系的重要特征。编译如下：

从 2013 年年中开始，中国外交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领导人对外交的投入。习近平主席通过广泛的出访和会晤，显示出了比之前领导人更多的对外事的重视，与此同时，李克强总理也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在与东南亚和欧洲的互动中表现积极。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持续上升，2015 年中国的外交主题又会是什么呢？

自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反腐上，同时加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政策上的优先空间已经不多，因此，国内经济改革的推进更多地已经是在技术层面而降低了政治优先度。

中国在对外政策的上的关注也巩固了一些发展成果。2014 年 7 月，中国举办了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峰会（CICA），这一峰会引起了一些对于中国试图建立把美国排除在外的亚洲地区机制的推测。但随着北京在 11 月举行了 APEC 峰会以及习近平与奥巴马之间进行了成功的会晤，并就碳排放、技术和军队对话制定了双边协议，那些担忧也随之减弱。

中国的国际政策在一段时间以来是平衡地介入现有国际秩序、实行渐进的“修正主义”----也就是通过符合实际的方式改革现有秩序。而在 2014 年后者出现的更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着手建立。与亚投行相配合的是 2014 年 7 月的建立一个新的金砖国家银行的协议，以及中国的“丝绸之路”计划（丝绸之路政策更多的是对中国在亚欧大陆已有参与的重新包装，而不是一个全新的计划）。而所有这些行动都不是孤立的，它们组成了比之前更具前瞻性的旨在改革国际秩序的行动。

然而这些仍不必被看作是企图取代现有秩序的行动。一些人是从清朝时期中国的区域霸权中受到启发来预测的中国与亚洲未来关系，而实际上中国受二战后体制的影响很大，在某些方面其参与国际关系的方式仍有战后全球秩序中的理想主义成分，这在它的坚持不干涉原则和国家主权平等中都能体现。也因此中国在国际决策过程中一直强调联合国的作用。

习近平在 2014 年 11 月国内一次有关对外政策会议上的发言阐明了领导层的意图，这次的语气较之前有所缓和。习近平谈到了改良而不是修正国际秩

序，讲话中并不能判断出中国已经准备好扮演全球领导者的角色，或者开始正视很快将要赶超美国实力的现实。

上述情况对于 2015 年的国际事务将产生什么影响呢？

首先，中国的经济外交将在规模和地域范围上扩展，中国也将借助经济外交来修补与区域内一些国家由于领海争端而被破坏的关系（尽管这种策略未必有效）。鉴于中美两国在安全事务上信任的缺失以及美国不愿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的关系，经济可能也会成为中国对美国关系中的着力点。

其次，中国可能采取更加温和的修正主义，通过参与国际机制来推动国际秩序的改革，或当改革不再有吸引力时，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这意味着在 2015 年，中国的对外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界，尤其是美国的行为，而美国由于反对了亚投行的建立，已经丧失一次向中国显示自己并没有意图限制其崛起的机会。

最后，中国可能在伙伴关系上进行重组。随着中朝关系的冷冻，这种重组已经在朝鲜半岛悄无声息地展开；同时，中国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重新平衡也十分明显；尽管中国领导人会在支持普京的修正主义时保持谨慎，但中国对外关系的优先对象仍然会是俄罗斯；西欧在中国的对外关系排名中仍会比较靠后；最后，伙伴关系重组最不可能发生在麻烦重重的中日两国之间，虽然 11 月份习主席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面使 2014 年年底的中日关系看起来比年初好些，但本质却并没有发生变化。

总之，中国今年的对外政策值得关注。

本文原题为“Chinese Foreign Policy: What to Expect in 2015”。本文刊于 2015 年 1 月 13 日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官网，作者 Tim Summers 是该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同时任教于香港大学。[单击此处可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简介：1964年由美国海军上将阿利·伯克和大使大卫·阿希尔成立。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CSIS主要就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其重点放在技术、公共政策、国际贸易和金融、能源等。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SIS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5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1名。

网址：<http://csis.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CIGI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由Jim Balsillie成立于2001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http://www.cigionline.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iie.com/>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 1920 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2 名，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6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